

文章编号:1673-1646(2009)04-0014-05

战后国际格局与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形成

檀跃宇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摘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国际战略。它的形成既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又是中共与美、苏关系演变的必然结局。在这一国际战略下,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主张达到了高度统一,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和有力的援助,从而巩固了新生政权。

关键词: 国际格局; 冷战; 中共; 一边倒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AN Yuey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PC) made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o lean to the side of the socialist group centering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affairs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ategy was not only closely linked to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also to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development of the CPC-US relations and the CPC-Soviet relations. New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coordinated with its ideology under the strategy. In addition, the strategy promot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thereby consolidated the new pow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cold wa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ning to one side

0 引言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重大决策。表面上看,这是中共一方主动的选择。然而,这一国际战略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它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中共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关于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必然选择。

1 战后国际格局与美苏对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新的世界力量中心美国、苏联的出现。二战后期这种国际力量格局上的巨

大变化,预示着战后世界国际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传统的欧洲强国,而是美国和苏联。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远东国际体系也正在形成之中,这一体系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美国与苏联正逐渐成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参战国,罗斯福政府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便确立了美国在远东要实现的两个主要战略目标:一是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二是在战后确立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无论着眼于战时的对日作战,还是战后远东的新秩序,美国都认为中国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出于对苏联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本能恐惧,还是出于对战后苏联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以至于威胁美

• 收稿日期:2009-04-20

作者简介:檀跃宇(1969-),男,博士生,讲师,从事专业:国际关系。

国利益的担忧,美国都将苏联看作一个难以对付的力量。所以,美国的外交思路是:既然无法抵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在远东树立一个统一、强大、民主、亲美的中国,以便于遏制苏联,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然而,战后的中国国共纷争、内部分裂,所以美国决策者对战后中国局势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美国的利益来实现中国的统一。从1944年夏季开始,美国政府开始积极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内状况,他们所设计的解决国共冲突的方案是促使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具体说来,就是由美国出面调停,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同时着手民主改革,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独立的政府,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中去。这不仅能够有效地防止苏联干涉中国的内政,抵御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好地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这正是从1944年以来至1947年美国特使赫尔利及马歇尔先后来华的任务所在。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个方面——大力扶蒋(即尽一切力量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与不介入中国内战——从一开始便是自相矛盾的^{[1]49}。

战后苏联虽然确立起军事大国的地位,但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先后遭到西方大国的侵略,苏联非常希望在自己的周边建立起一系列的缓冲国或缓冲区,以便与西方势力隔离开来。对于远东,苏联也想让外蒙古、中国东北起到类似的缓冲作用,同时恢复沙俄在满洲的权益。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的要求获得了满足,而斯大林对美国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然而,随着美苏在波兰、伊朗、土耳其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的加剧,双方的关系很快便全面恶化。在美国单独控制日本之后,苏联对美国在东亚的戒心明显加强。鉴于国民党政府的亲美倾向,苏联这时试图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的东北经济谈判以及在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至东北接收问题上设置障碍,以阻止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取得政权以及阻塞美国向那里渗透的渠道。但美苏都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而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问题在于国民党的目标是武力灭共,美国正是其借助力量。正是依靠美国海空大运兵的支持,蒋介石才能将主力部队北调,占领

了东北的半壁江山。一位亲身经历中国战乱的美国普通士兵认为:“正是我们使得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正是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帮助,大大延长了中国内战的时间,并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更为残酷。”^{[2]645-663}

国民党政府的亲美性质以及其接收东北的努力在美苏对立的形势下,必然使得苏联将国民党的对手中共作为制约国民党政府的借用力量。而作为中国内战冲突双方的国共也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于是美苏之间的冷战与国共之间的内战便不可避免地交织到了一起。随着美苏之间的关系在1946年2月以后日趋全面恶化,国共两党的态度也迅速强硬起来。美国为了确保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尽力调解国共冲突,一方面又给予国民党大规模的援助。美国的援助不但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而且坚定了他们反苏反共的决心。这又使得苏联对国民党“亲美反苏”的疑虑进一步大增。随着1946年6月底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对立,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

2 1945年~1949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经过抗日战争,苏联和美国先后成了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因此,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国民党以消灭中共为目标的形势,中共立刻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相比,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发展相对较晚,并且主要开始于二战后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美国的战略方针是“先欧后亚”,特别需要中国顶住日本,因此,美国开始从军事、经济上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给予大规模的援助,同时为了让战后的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以及抵御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又积极地从政治上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共的外交实践中,对美政策与交往占有突出地位^[3]。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大后方开展了“以美国为主”的对外交往活动^{[4]375}。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首先确认开展对美外交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其次提出中共应该首先争取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政治、经济合作的可能。此后,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5]26-27}。政治上,中

共对美国出面斡旋国共关系予以积极的回应。

然而,中共争取与美国合作的努力很快就陷入困境。1944年11月上旬,赫尔利与中共签署了《五条协定草案》,可是,蒋介石对该草案拒不接受,于是,赫尔利又反过来要求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战时国共谈判由此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此外,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到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时,美国已基本放弃了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打算。中共与美国之间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失败从根源来说仍在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罗斯福看来,战后的中国,只能由蒋介石和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只能扮演配角。但是,历经抗战,中共已经成长壮大成为中国的一大政治力量,因此,任何绕过中共求得中国问题解决的想法均是不切实际的。于是,美国的办法便是由国民党对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进行适当的民主改革,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同时保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然而赫尔利介入国共矛盾的调停后,把美国对国共矛盾的“调停”逐渐变成了国、美对中共的联手打压。1945年4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赫尔利宣称: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6]153-154}。赫尔利的讲话,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为扶蒋抑共。由于确信美国在国共斗争中将站在国民党一边,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全党警惕斯科比式的外来干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7]195}。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内战爆发,这个时期,中共对美的总政策是促其“中立”。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美、苏都不赞成中国内战。据此,会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认为中国开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8]591}。从此时起直至1946年年中,中共的方针一直是力争和平。1945年11月28日在《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中立美国”,即在国共斗争中要设法使美国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9]32}。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战后“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扶蒋压共反苏”;蒋介石的政策是“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然连上共”;苏联的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斗争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中共在对蒋斗争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也可中立美国”^{[9]32}。“中立美国”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减缓中

共在对蒋斗争时的困难,特别是防止美国可能的干涉。美国政府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大规模援助的行为,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意味着美国已经采取公开支持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日趋激烈。1946年9月底,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时,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借所谓的“调解”作掩护,助蒋内战屠杀,使中国实际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10]1202}。同年10月上旬,周恩来在同马歇尔的一次会谈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马歇尔表示,中共对他的“公正”立场已丧失信任,并暗示他应立即退出调解^{[11]270}。

通过与美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斗争,以及美苏矛盾日趋激化、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美苏之争并不妨碍中国革命,大国介入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都相当有限,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有鉴于此,1946年8月在会见美国左倾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把美国和中国的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10]1195}。1947年1月,陆定一在《对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的文章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美苏矛盾不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12]555-568}。该文的发表预示着中共开始实行一条全面反美的路线。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号召在全世界反对共产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6月,马歇尔提出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其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段,在西欧逐步形成以美国为盟主的抗衡苏联的力量。面对美国的外交攻势,9月,苏联迅速反击,在其主导下,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宣布世界已经形成两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而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及两个阵营的形成,从客观上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对中国事态的干预能力。在此情况下,在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中共将与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10]1260}。

当1949年4月中共军队占领南京之后,美国仍然拒绝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并以中共不向苏联靠拢、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在新政府中吸收“自由人士”作为承认新中国的条件。中共与美国在这些方面自然不可能互相让步。

3 1945年~1949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但在抗战时期,由于斯大林对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以及它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趋于冷淡。

抗战结束前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在避免与美国冲突的情况下维护苏联在东亚的既得利益。根据《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与宋子文一行进行会谈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协定。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苏联以在中国只承认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中共为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以及恢复了当年沙俄在满洲的大部分特权。《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塑造了战后初期以美国、苏联、国民党政府为主的远东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中,苏联通过维持与英美以及蒋介石政权的良好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在此情况下,尽管苏联与中共在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党际关系,但在其东亚利益的驱使下,它在国共问题上选择的外交方针是竭力避免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对抗。反过来说,如果苏联在东亚和中国东北的利益受到了美国和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的威胁以至侵害,那么苏联也不会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或国民党政府。

在此背景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苏联与美国一样力求促成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这是因为:首先,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如果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受到道义上的压力将不得不支持中共,从而处于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对立的地位,这将使得苏联已获得的东亚权益受到影响;其次则是斯大林非常重视军事实力,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只懂得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师?”^{[13]519}”与美国主张国共谈判是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共试图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人造奶油式”的中共根本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因此,抗战结束时的东亚国际局势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有美国人的帮助,但中共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10]1132}。然而,中苏关系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出于反对美国 and 国民党控制东北的共同目的,中共与苏联开始了在东北的战略合作。这一合作不仅成为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构成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块基石。

中共在抗战后期考虑和规划中国革命的发展前

途时,已经认识到与苏联接壤并且物藏丰富的东北的重要性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如果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7]232-233}”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命令吕正操、张学诗等所部向察、热、辽、吉诸省挺进,配合苏军在东北作战,并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14]219}。这样中共部队先于国军进入了东北。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15]371-372}。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共的行动会影响苏联与美英的关系。1945年9月14日,贝鲁索夫中校作为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携马氏的亲笔信飞赴延安。该信要求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16]490}。然而时隔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在1945年9月伦敦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因此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其次,1945年10月份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登陆东北的计划使得苏联认为美国意欲插手东北;再次是自1945年10月起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东北经济合作谈判至次年3月苏军开始撤退之前仍未能达成协议。苏联之所以要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东北经济合作谈判,是为了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垄断性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定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独占势力范围。谈判的失败使得斯大林独占东北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战略落空。于是,苏联实行闪电式撤军,使中共部队赶在国军之前顺利进入了苏军撤出的城市和地区。此外,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在撤离之前以缴获的日军的大量的武器弹药装备了中共东北军队。

1947年夏秋,中共军队转入了战略反攻。而在欧洲,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标志着美苏冷战的马歇尔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和美苏在欧洲冷战的加剧进一步坚定了苏联积极援助中共的政策。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对即将派往中国解放区的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向新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两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我们就不怕任何突发事件的威胁。因此,对于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自己

的力量。^[17]”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援助为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东北解放过程中所培育起来的中共与苏联的友谊同时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结为同盟的基础。

到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结束之时,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已指日可待。在此情况下,中共与苏联有必要就未来新中国的内外政策予以充分的沟通与协调。通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访西柏坡以及中共代表刘少奇等秘访苏联,在新中国的内外政策上苏联与中共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实行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0]1472-1473}

4 余 论

“一边倒”,既是中共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反帝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逻辑,也是二战后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中共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抗战结束前后,通过赫尔利和马歇尔的两次调停,中共逐渐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从而放弃了“以对外外交为主”的政策;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美国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从而成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与此对照,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俄国视为榜样,尽管抗战期间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一度比较低迷,但在战后的国共内战中苏联一直对中共给予同情并秘密提供了大量援助。中共与苏、美两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决定了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中共必然选择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指引下,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主张形成了高度契合,新中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都得到了较好的实现:通过1950年的中苏同盟,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获得了有效保障;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残余势力被彻底取缔、铲除。因此,在二战后的两极国际格局下,“一边倒”国际战略的

实行不仅有利于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巩固,而且也为此后新中国以后的发展与富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长期来看,该战略也造成了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以及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适时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弥补“一边倒”造成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 [1] 资中筠. 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 (美)格兰姆·贝克.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M]. 上海:三联书店,1987.
- [3] 陶文钊.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J]. 美国研究,1993(1):7-28.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5] 章百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G]//袁明,哈里·哈丁. 中美关系史上的沉重一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6] (美)孔华润.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8] 金冲及. 周恩来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 [9]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1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章文晋. 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1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3]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M]. 上海:三联书店,1974.
- [14]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M].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5]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7] 张盛发. 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J]. 世界历史,1999(6):19-31.